

# 「主義之軍」的崛起

## ——近代中國軍人形象的變遷

• 王 鴻

**摘要：**本文嘗試從思想史視角分析晚清到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軍人形象論述的變化，並以此來理解1920年代「主義之軍」崛起的內在理路。從晚清到五四，軍人形象實際上呈現出明顯兩極的落差：在晚清，緣於時局日趨嚴峻，以及民族國家建構的急務，軍人被推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思想界有着明顯的軍人崇拜傾向；而在五四時期，面對軍人強權所引發的政治亂局和歐戰後全世界批判軍國主義的思想潮流，「去兵」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1920年代「主義之軍」的崛起，便承載了晚清和五四這兩個時代所賦予不乏張力的遺產：其現實氣質與晚清危局下濃郁的政治現實性有所聯繫，而其理想主義氣質則明顯受到五四精神的影響。

**關鍵詞：**「主義之軍」「軍國主義」「去兵」知識份子 新軍人

無論對於政治史而言，還是對於思想史來說，1920年代都是重要的轉折時期。這一轉折的過程，並非簡單的、由此及彼的變動，而是涵蓋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多點成面，最終匯聚成一個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歷史進程。若要對這一轉折過程作比較系統的論述，進而勾勒出其中細微的曲折性和複雜性，顯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的論述也只是嘗試描述其中一個面向，那就是伴隨着1920年代政治和思潮的波動，知識份子對軍人形象論述自晚清以來的變化，特別是在「主義」和「革命」興起後帶來的整體性變化。當然，作為一項歷史學的研究，本文所着眼的，並非僅局限於1920年代的變化，而是嘗試勾勒自晚清以來軍人形象由盛極而衰到1920年代浴火重生的整體過程，

\* 本文曾在北京大學舉辦的「轉折年代：從新文化運動到國民革命」青年論壇（2016年8月23至26日）、華東師範大學舉辦的「思想與政治場域中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工作坊（2016年11月19至20日）中宣讀，感謝與會老師的批評與指正。

希望通過對軍人形象論述變化的考察，窺一斑而知全豹，更好地認識1920年代在中國近代史上所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性。

對於近代中國軍人和軍事的研究，無論是政治史還是社會史，都已經有相當多的研究成果，為我們了解相關史實提供了重要的基礎<sup>①</sup>。不過，近代中國軍人在極短時間內迅速崛起這一事實，對於有着長久文治傳統和較為穩固的四民結構的中國社會而言，顯然意味着一種並不常見的歷史變局。對於這一歷史變局，學者若是專就軍事本身來進行探討，或是簡單地將之與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結合起來討論，雖然有助於我們了解軍人地位崛起的相關史實，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忽略身處其間的人們，特別是知識份子和軍人自身，對於這種變局的理解。可以說，軍人何以在當時急速崛起，固然是政治史和社會史的問題，但同時也是思想史的問題。若從此前的研究範式入手，那麼就必須考慮包括士農工商等在內的整體社會階層的變遷，要特別留意當時具體的政治變遷和制度改革。但是，本文所側重的倒不是這種現實層面的變化，而是試圖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待當時的知識份子（包括部分以軍人為職業的知識份子）如何理解軍人地位的崛起，並由此勾勒晚清到1920年代思想界關於軍人的認知變化。

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之所以用「主義之軍」而非「黨軍」，乃是為了在尊重其外源性因素的同時，更為突出其形成的內在理路。在本文看來，1920年代軍人形象的變化，固然與外來的「黨軍體制」有着緊密的聯繫<sup>②</sup>，但若是從晚清到五四的長時段變化來看，當1920年代軍人以「主義」之名出場時，其實也有其切合歷史內在脈絡的深刻緣由。為了突出這一內在歷史脈絡，本文不會徑直探討1920年代的軍人形象，而是首先結合晚清和五四這兩個時期的歷史背景和思想史脈絡，分別探討其間軍人形象的變化，以及分析造成此種變化背後的緣由。結合這兩個時期軍人形象的變化來看，1920年代崛起的「主義之軍」，固然有其外源性因素，但也顯然並非橫空出世之「舶來品」，而是其來有自，緊密聯繫着近代中國歷史的內在變遷。

## 一 晚清的「軍國主義」與軍人崇拜

中國思想的現代轉型千頭萬緒，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在於原本以儒家政教為中心的文治傳統在新的歷史時勢面前被推倒重來，右文逐漸轉變為尚武。1903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的〈論尚武〉裏，便特別指出文治傳統與新的歷史時勢之間的扞格之處，認為自秦一統天下以來，雖偶有內部的分裂，但大抵太平歌舞，四海晏然，以致「習為禮樂揖讓，而相尚以文雅」，重文輕武，民氣柔靡，「遂使群國之人，奄奄如病夫，冉冉如弱女，溫溫如菩薩，戢戢如馴養」<sup>③</sup>。及後楊度借助嚴復翻譯的《社會通詮》（*A History of Politics*）中關於「蠻夷社會—宗法社會—軍國社會」文明三階段一說來論證軍事的重要性，但仍然沿襲了梁氏的說法，認為除非一改往日積弊，「使中國成一完全之軍國社會，以與各軍國同立於生存競爭之中」，否則難免於劣敗<sup>④</sup>。晚清之世，在由「天下」轉變為「列國」的形勢下，人們以詞章為能事，致武事廢弛，正如當時一則關於軍人題材書籍的廣告詞所指出：「人皆經武，我講詞章；人

皆整軍，我重帖括，以致軍國上下，文弱風行，流毒至今，疆圉朘削。噫！是誰之過？皆由國民不知軍人之尊貴而鄙棄軍人也。」<sup>⑤</sup>

在救亡無日的晚清，從新的歷史時勢下質疑文治傳統，到對於「軍國」的高呼，再到尊崇軍人，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思考。梁啟超在〈論尚武〉中，便斷言「立國者苟無尚武之國民，鐵血之主義，則雖有文明，雖有眾民，雖有廣土，必無以自立於競爭劇烈之舞台」<sup>⑥</sup>。他的話代表了當時許多人的心聲，《新民叢報》便在「兵事」一欄分四次連載蔡鐸的〈軍國民篇〉<sup>⑦</sup>，同時也刊登蔣方震翻譯的日人文章〈軍國民之教育〉<sup>⑧</sup>，頗高調地主張「軍國民」、「尚武」等一系列新觀念。至於當時由留日青年知識份子所創辦的刊物，也發表或翻譯了一系列相關文章，從多種角度探討軍人的重要性<sup>⑨</sup>。而一些軍人群體所創辦的雜誌（如《武學》、《軍華》<sup>⑩</sup>），更是連篇累牘地確證軍人自身在歷史和時局中的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晚清社會對於軍人的看重，其實並不是此時才出現，早已有論者指出太平天國時期出現的「地方軍事化」現象以及隨之而來握有地方實權的督撫權力遽漲的情況<sup>⑪</sup>。不過太平天國之後，隨着洋務運動的推進，軍人地位崛起固然是個已知事實，但是本質上仍然未改變軍人在傳統社會結構中的邊緣位置，重文輕武仍為眾所推崇。崛起於地方、並最終聲動天下的湘軍、淮軍，仍不過是以「儒生領山農」<sup>⑫</sup>的方式，依託血緣、地緣、學緣建軍，並非受訓的職業軍隊；雖平定了內亂，但仍未改變積習。即使是後來一些地方督撫有感時局困厄，一面辦廠製械，一面整軍經武，也不過發揮了儒學本有的致用理念，只觸及「用」的層面，而未嘗深入到「體」的維度。清末軍事改革並未曾觸動雷海宗總結的所謂「無兵的文化」的社會結構，秦漢以來兵、民、國之間的對立情況也沒有改變，「文德」仍然重於「武德」<sup>⑬</sup>。

對於這種現狀，梁啟超在當時便直言：「吾國之講求武事，數十年矣。購艦練兵，置廠製械，整軍經武，至勤且久，然卒一燬而盡者何也？曰：彼所謂武，形式也；吾所謂武，精神也。」<sup>⑭</sup>他敏銳地意識到，當時中國所需要的已不再是以往那種強調步伐一致、獨立於政治與社會之外的形式之軍，而是緊密聯結民族國家建構的精神之軍。在他看來，「軍隊之形式專制也，而有其精神焉」，軍隊的精神緊扣着當時所強調的群治理念和國民自治精神：「群之自治之極者，舉其群如一軍隊然，進則齊進，止則齊止。」<sup>⑮</sup>這種「形式」與「精神」的二元對立是當時對軍隊的普遍看法，例如蔣方震在上述的翻譯文章中，也曾將軍人分為「形質」和「精神」兩種。雖然他不像梁啟超那樣只強調精神面，而是二者並舉，但是文中同時也提出「苟無其精神，則國本不能立，而國終不能成」<sup>⑯</sup>。此後，甚至有人不無極端地認為：「軍人之精神氣力，國民之精神氣力也；軍人之行動舉止，國民之行動舉止也。精神氣力之盛衰，行動居止之正邪，不獨關係於軍人之名譽污辱，則凡一國之體而氣運，皆繫於軍人之一身焉。」<sup>⑰</sup>

另一方面，之所以提倡軍人精神，除了是對民族國家理念的高唱外，也與洋務運動以來對軍隊能力的反省有關，這主要反映在一些軍人的言論中。唐繼堯在當時將軍隊分為「精神」與「物質」兩個方面：「軍隊者，猶人之身也。精神教育，猶身之腦筋也；物質文明，猶身之指臂也。」不過，相比物質層

面，他更強調精神層面，認為「軍隊者，國家之骨幹也；精神教育，又軍隊之骨幹也」。在他看來，面對着「二十世紀之鐵血世界」，「非刷新軍隊不可」，而「刷新軍隊非注重精神教育不可」<sup>18</sup>。這種看法在當時的軍人群體中相當普遍，有人便直截地認為「戰爭勝敗之所攸分，在精神，不在形體」<sup>19</sup>。至於軍人精神的內涵，當時的說法很多，但大抵可概括為「愛國心」、「自愛心」、「自信心」、「名譽心」、「公德」等，認為只要守此精神，便奠定了戰勝的基礎<sup>20</sup>。

由此看來，一方面當時部分知識份子認為，民族國家的建設需要軍人那種講求秩序和活力的精神，以掃除傳統中國的重文輕武心態，而另一方面軍人自身也意識到只有將民族國家的觀念納入軍人的精神世界，才能夠提高戰鬥力，實現軍人自身的價值，從而立足於當時的「鐵血世界」。在晚清的最後十年，我們可以看到這兩方面逐漸匯合成一種籠罩性的思潮，那就是「軍國民主義」。以當時執思想界牛耳的梁啟超而論，他一方面以皇皇十多萬言的《新民說》宣導「公德」、「國家思想」、「權利」、「義務」、「自由」、「自治」、「合群」、「自尊」等源自西方的文明觀念，但同時又輯成《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回顧傳統中國的「霸國政治」，主張改變中國重文輕武的習性，「合五洲而成一大戰國」，如彼時西方文明諸國那樣「以武俠聞於世」<sup>21</sup>。就前者而言，「國民」、「民族」的觀念由此普及於世，這一點已為眾多研究者所廣泛道及<sup>22</sup>；就後者而言，名噪一時的「軍國民主義」頗值得留意。

晚清之世國人鼓吹「軍國民主義」，最直接的原因是當時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在1903年因拒俄運動而興起的「軍國民教育會」中，一些論者便有意地誇大情勢的危急性與戰爭的急迫性，認為「論今日之勢，戰與不戰，亡一也，不如先戰。且今日不戰，終必不能不戰，不如早戰。抑今日不戰，且無從一戰，尤不如急戰」<sup>23</sup>。因此，只有及早組織軍國民，中國才能夠免於敗亡。這樣的論述在當時很多，由此催生的是一種由對外敵的恐懼到推崇戰爭的心態，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好戰之國，其國必食戰福；畏戰之國，其國必受戰禍；喜殺人者，人崇拜其國；戒殺人者，人攘奪其國」，而所謂的「軍國民者，製造一種喜戰好殺之性質之國民，以安寧範圍其國家者也。賤武右文之國，其國用不得受威」<sup>24</sup>。

除了應對外敵的急切心態外，知識份子之所以提倡「軍國民主義」還有以往較少為人所注意的面向，那就是當時他們所認識的文明圖景出現了變化。以梁啟超為例，他最初所構想的應敵之道，其實並不是建構軍國民，而是試圖接引西方十八世紀以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為代表的「平權派」的觀點 (其對立面則被認為是西方十九世紀末興起的、視「權力即道理」的「強權派」的觀點)，由民權出發建構民族主義<sup>25</sup>。然而，情勢的緊迫最終促使梁啟超轉變態度，指出「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sup>26</sup>。梁啟超在當時的思想轉變並非孤例，我們可以發現在喧囂一時的民族國家建構氛圍中，雖然諸多的建國方案是以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戰爭作為典範，但是在當時一些人的言論中，也頗為獨特地提出以斯巴達—德意志—日本為代表的國家建構之路。在1903年便有人撰文指出：「軍人之魂，胎源於希臘，盛行於羅馬，今德意志其宗子，而日本則裔孫也。」<sup>27</sup>不少人援引俾斯麥 (Otto von Bismarck) 的鐵血主義與日



本的「大和魂」和「武士魂」觀念，認為後起的德國與日本正是走了有別於英、法、美的文明之路，採行「軍國民主義」，才得以屹立於強國之林。由此，講求秩序的民族國家建構的強烈渴望，促使「進則齊進，止則齊止」的軍人精神被推上了歷史舞台，右文一轉而為尚武。

軍人本與流血、殺人相關，予人野蠻的形象，但在1900年代初喧囂的氣氛下，卻出現諸多以「國家」之名義為軍人辯護的文字。藍天蔚在當時便有一篇題為〈軍解〉的文章，指出軍人乃是「文明」與「野蠻」兼具的形象，又指出：「欲直行軍國民主義，必以文明為腦，以野蠻為體，文明其心思，野蠻其手段，而後可以文明待同族，可以野蠻待外族。」<sup>⑳</sup>與藍天蔚的論調相似，數年後劉基炎在《武學》雜誌的發刊詞上，縱覽各「文明國」之歷史，認為像普魯士、俄羅斯、日本這樣的「國際之野蠻者，乃反為國內文明間接之導火線」，而像「古之希臘、埃及、波斯，近代之印度、安南、緬甸、朝鮮，皆以文明之國，廢弛武備，卒底滅亡，此尤可為痛心疾首者」。他發現「和平則導文弱，戰爭則勵武德」，而「野蠻即文明之護符，文明乃野蠻之產子」。如果一個國家欲達到文明之高度，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以「從事於國際戰爭為起點」<sup>㉑</sup>。

藍天蔚、劉基炎都是軍人出身，他們的這些言論當然存在着自我認同，但是之所以如此言之鑿鑿，卻顯然與晚清社會，特別是思想界的軍人崇拜和尚武精神息息相關。憑藉對所處歷史形勢和文明圖景的判定，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強調軍人精神對國家建構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的同時，也以「立國」之名義順勢掀起了軍人崇拜。在1908年便有人高呼，「兵乎，兵乎，為立國之本，為文明之標幟」，認為「軍人二字，直可作表示人類所以生存之紀功碑」<sup>㉒</sup>。甚至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有人直截地指出：「軍人者，乃世界文明之花也，是軍人之左右世運，而促人類之進化，其功德可令人尊崇者又如此。」<sup>㉓</sup>伴隨着這些從文明論的角度歌頌軍人的言辭，逐漸出現了一種趨勢，那就是軍人精神不只是民族國家的內在要求，而是被視為凌駕於政治之上的產物。如劉基炎所說，「政治、教育、實業等，固不可不早為改革，然實未有若軍事之為急。急者何？則軍事不振，則萬事皆棘手之地，雖欲改革亦難期成功也」<sup>㉔</sup>。可以說，對於這些發表時間不一、但主要集中在清廷覆亡前十年的言論，若是我們援引嚴復在〈原強〉中所試圖尋求的標本兼治之策來加以檢視，那麼在「收大權、練軍實」與「民智、民力、民德」之間<sup>㉕</sup>，前者似有逐漸壓倒後者之勢。

## 二 五四運動前後的「去兵」浪潮

晚清至五四時期的這段歷史有一定延續性，「沒有晚清便沒有五四」的說法在學界並不罕見，但二者之間也有着互為區別的斷裂性。以這兩個時段對軍人形象的看法作比較，前者視軍人為「文明之花」，高呼強權；而後者倡議「去兵」之道，各種主張大都以鄙棄強權為主。翻閱五四時期的報刊雜誌，我們會看到大量關於「去兵」的討論，像《新潮》上傳斯年發表的〈去兵〉、汪伊真的〈萬惡之「治」〉；《新青年》上王星拱發表的〈去兵〉、胡適的〈武力解決與解決武力〉等<sup>㉖</sup>。《改造》雜誌甚至還專門推出「廢兵研究」專題，刊登了藍公武

的〈廢兵論〉、志公的〈廢兵之研究〉、謝楚楨的〈中國的廢兵與國際的廢兵〉、彭一湖的〈再論廢兵〉等文章<sup>⑤</sup>。這些文章的內容側重的面向不同，但都反映出和晚清截然有別的趨向：軍人不再如晚清時被頌揚為文明進化的推動力，相反，卻被認定是政治亂局的淵藪，成為在新的時勢下不得不打倒的力量。

此時對軍人的否定，主要原因之一在於晚清知識份子對軍人的推崇並沒有帶來預期中國家既富且強的局面，反而引發了武人割據的危局。軍人政權在尚武、「軍國主義」思潮的鼓動之下，在袁世凱的強人政治倒塌後轟然而起。他們干預國會，任意製造民意，卻沒能帶來一個有別於黨同伐異的共和政局。更有甚者，如果說黨同伐異仍然略需章法，受到共和政治在制度上的限制，那麼武人政治則是將權力赤裸裸地展現，晚清以來「以強權為公理」的口號在這裏得到了最極致、也最殘酷的演示<sup>⑥</sup>。在這種危局之下，「去兵」自然成為當時思想界的應對之策。

除了國內政局外，當時關於「去兵」的另一個思想源頭，則緊密地聯繫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初思想界的國際局勢觀感。稍稍瀏覽當時的雜誌，我們就會發現「去兵」的呼聲其實與一戰後思想界對於軍國主義，特別是對德國軍國主義的批判在時間上基本重疊。筆者曾經做過初步研究，發現在一戰爆發初年，中國思想界在講求民主主義、注重國民覺悟（特別是「青年」覺悟）的「法國道路」與講求國家強權和秩序的「德國道路」之間徘徊<sup>⑦</sup>。然而，隨着德國在一戰初期狂飆式突進，受到協約國在歐洲東西兩面的遏制，作為軍國主義模範的德國在中國知識份子眼中也漸漸發生了一些變化。特別是德國在1917年初發動「潛艇戰」<sup>⑧</sup>，令海上進攻範圍波及中國、美國等中立國後，其強勢的形象被視為霸道，德國因而被視為不守國際公法、徒恃強權的國家。隨後美國對德宣戰，中國、巴西等國也加入戰局，群起而攻之，致使其陷於一敗塗地之境地。晚清時高呼尚武精神、一戰發生初期又作《歐洲戰役史論前編》<sup>⑨</sup>高歌德國的梁啟超，面對着既成戰局，也不禁感嘆：「這德意志誰不知道是地球上天子第一號的強國，開戰四年以來，沒有敗過一次，今日裏嘩啦啦一聲就一敗塗地到這種田地，這可也是人人料不到的。」<sup>⑩</sup>

五四期間「公理戰勝強權」的呼聲不絕於耳，成為當時學生運動的重要口號之一。不過，「公理戰勝」的口號與其說反映了一種事實，倒不如說是當時思想界的一種期待。當知識份子借助一戰中德國的失敗大力批判軍國主義，雖不能說沒有人類大同的世界主義傾向在背後支撐，但他們的文章中也顯露出對國內軍閥危局的批判。陳啟修直截地批評，「『北洋政策』之根本，為軍國主義，而『軍國主義之實際的效果，可於最能實行軍國主義之國家即德國之末路覘之，不待繁證』<sup>⑪</sup>。梁啟超在上述所引的關於一戰教訓的文字中也坦言：「這回德國失敗，簡單一句話說明，就叫做軍閥的末路。」他同時描述當時國內的軍人群體，不無幽默卻又不乏無奈地說：「我已為我們這丘八爺的頭兒看見這種情形，在自己拿鏡子照一照，他的尊範總該有幾分慙愧，有幾分惶恐。……萬不料還是從前一樣的成群結隊、張牙舞爪、開口政治、閉口法律，總統的事也要管，內閣的事也要管，國會的事也要管。」<sup>⑫</sup>

在這些零零散散的文字中，晚清時高唱「軍國主義」的蔣方震在五四時期寫的多篇文章也很值得留意。蔣方震對當時的形勢看得很清楚，他總結起

來說道：「一二年來，『軍國主義』四字，已成為社會上之共同攻擊目標，此其原因有二：一、十年來武人政治之結果，社會俶擾，民生困窮，而武人自身之貪暴，尤為國民指摘之媒。二、歐戰之興，西方則感於德軍之橫暴，東方則感於外交之失敗，而軍閥派侵略主義之罪惡，遂為一種鼓吹敵愾之用。」<sup>43</sup>他追溯甲午以來的中國政局，並將軍國主義與此前甚囂塵上的立憲運動結合起來思考，認為「自甲午庚子以還，國人感於內治之不修，而外禍之日亟也，思有以藥之。於是有軍國主義，對外者也，其結果為北洋練兵；於是有立憲運動，對內者也，其結果為預備立憲」。在當時的局勢面前，蔣方震對於過去自己高唱「軍國主義」與「立憲運動」顯然心生悔意。在他看來，這二者之間其實並沒有多大差別，「其間承上起下之機關，全在一種特別階級之貴族」<sup>44</sup>。「三十年前以日德為模範，曰國家主義，曰軍國主義，而卒形成一種似是而非之武人政治」，在新的時勢之下，特別是在「平民政治」的鼓盪之下，這種「特別階級之貴族」顯然成為急需剷除的對象<sup>45</sup>。

雖然蔣方震在後世更多被視為一個軍人，但他的這番認識正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普遍趨向。在歐戰與國內軍閥亂局的雙重衝擊之下，當時對於軍人形象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種是批判軍人的權貴屬性。陳獨秀便把軍人和官僚、政客並列，稱之為「三害」<sup>46</sup>。陶履恭也指出「現在軍界的人比現在政界的人還高貴」，並認為軍人「常是跋扈一切，干涉他職分外的事務」<sup>47</sup>。另一種批判則源於軍人形象與當時甚囂塵上的「民主」觀念和「個性」意識的衝突。李大釗在〈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中便將軍人視為“Pan……ism”的一種，認為與“Democracy”中「平權主義」精神相違背，「前者尚力，後者尚理；前者重專制，後者重自由；前者謀一力之獨行，後者謀各個之並立」<sup>48</sup>。而在學生群體中頗有名氣的傅斯年也認為當時的潮流是「發展人的能力」、是「自由」、是「人道精神」，但軍人卻「滿身上都是木偶氣」，「無意識的上陣地」，「發揮着獸性」，倒行逆施，「是舊政治、舊社會、惡政治、惡社會的結晶核」<sup>49</sup>。

這些對軍人形象的批判，既反映了時人對於軍閥亂局的不滿，也反映了他們試圖突破軍人崇拜的情結，想像另外的替代性方案（下詳）。需要強調的是，這些關於軍人形象的認識，大多數是知識份子的言論，少部分則是軍人的看法，但是當它們逐漸匯聚成一種社會公論的時候，卻也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與晚清時整個社會高呼軍人神聖顯然不同的是，五四以後的軍人形象卻一落千丈，甚至在當時的通俗文學中出現了一些以軍人口吻進行自我批判的言論。1923年刊載在《晨報副刊》上一篇以〈一個覺悟的軍人〉為題的短篇小說中，便頗為有意思地以對話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年輕人向軍人朋友請教是否應去當兵的故事<sup>50</sup>：

我說：「你還不看見城裏的軍人，那種闊綽的樣子呢。好些個朋友們，都勸我去當兵，尋個出身呢。」

他很驚異的說道：「現下的軍閥，是人人痛懼的；軍人，是人人厭惡的。你不知道嗎？你還想當兵嗎？我不是敢說我國軍人，沒一個好的，

不過好像大海的水，是碧黑的，鹹苦的，就是有一兩條清的淡的，流了進去，依舊變成海水的色味了。」

在這個對話中，軍人的闊綽與軍人受厭惡的形象構成了強烈的對比。當時另一篇刊載在《小說日報》中的同名文章也認為：「我國的軍人，的是萬惡，招之即為兵，散之即為匪，就是能夠死命奮鬥的，也不過把性命去與軍閥爭地盤罷了。」<sup>⑤</sup>還有一篇發表在《小說世界》上的文章，以臨死的軍人為主人公，講述了軍旅生涯的無奈<sup>⑥</sup>：

我自從初進軍營時，便認定奉行這——服從——兩字是軍人唯一的天職，那曉得我的罪孽，便成於這——服從——兩字上。我的一生，也斷送在這——服從——兩字上。像這回東西的戰爭，本來是他們雙方當局的權利衝突，與人民、與國家、與我們，都是無干的。我們的長官，因為看見我們平素都是竭力奉行這——服從——兩字的。他們就利用我們這種特性，叫我們去當這戰爭之衝。我們也不仔細想一想，一直就跑向前敵去。到了臨陣的時候，愈加守着這——服從——兩字，死也不肯放他去。長官叫我們去殺人，我們也就去殺人；長官叫我們去搶劫，我們也就去搶劫。長官叫我們去放火，我們也就去放火。……我自從戰地回來以後，天天受良心的審判，我只是俯首無言，現在已快要宣告死刑了，尚復何言呢。唉，諸位朋友呀，你們的前程遠大，從此覺悟還不遲。

我們很難斷定這些文字是否真的由軍人所寫，但當它們以軍人的口吻來進行表達時，我們會發現歷經了對軍閥政治和歐戰後軍國主義的批判，五四之後顯然出現了一種鄙薄軍人的社會輿論。可以說，雖然最初發起「去兵」構想的是知識份子，但在他們的鼓動之下，「去兵」思潮卻也逐漸滲透到社會輿論當中，構成了理解那個時代的重要面向。

### 三 從「歡迎新軍人」到「主義之軍」

從晚清到五四時期，軍人形象在思想界和軍人的自我想像中呈現出顯著差別。不過，這兩個時期當政者也同時面臨着如何整頓軍人的問題。如果說晚清所面對的是三十年洋務運動片面講求器物的偏頗，與列強環伺下提升民族國家軍事戰鬥力的急切需求，那麼五四時期所面對的則是高漲的民族主義，以及對強權的高呼後所形成的軍閥割據、以強權為公理的局面。在晚清，洋務運動以來整軍經武的不滿所催生的是對新式軍人的尊崇，但五四時期對軍人的不滿卻帶來「去兵」的時代公論。面對這種思想氛圍的變動，雖然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仍處於軍人強權的籠罩下，卻提出了大量關於「去兵」的想法和方案。

五四時期，最初思想界想到以新思潮影響軍人，這似乎又回到了晚清的「形式」與「精神」二分法，但與晚清強調軍人的民族國家意識截然不同，此時



的新思潮是新文化運動鼓動下的全新理念。藍公武便自信地宣稱：「今所欲舉以告國人者，則我固有不用兵，而可以鏟除世界之武力者。其道維何？即所謂新思潮是焉。」而所謂「新思潮」雖然眾說紛紜，但在他看來，「要其一貫之精神，則不外人道與平等二義」。這「人道與平等」帶來的新精神，即「人為一切事物之目的，而非任何目的之手段」。那些以人為手段的各種罪惡，如軍國主義、特權政治，皆可廓清拔除，「至如愛國、愛種等等偏見，有足以挑撥人類間之反感，塗炭生靈者，亦皆在剷除毋赦之列」<sup>53</sup>。

像這樣試圖通過新思潮重新改造軍人的方案，在輿論界中不在少數。揆諸當時林林總總的說法，其中一種說法逐漸佔據輿論主流，並掀起了較大的實質性影響，那就是「化兵為工」，即是將軍人改造為勞動者。這種想法並非五四時期才出現，早在晚清時便有無政府主義者提出類似的看法<sup>54</sup>。在晚清高漲的民族主義籠罩下，無政府主義者的言論雖然也引起了一些關注，但當時社會的主要潮流並不在廢兵，而在於軍人崇拜，所以影響力較小。然而，隨着在晚清時便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等人在知識群體中漸居指導地位，這些無政府主義的理念也因對應時局而逐漸傳播開來。特別是在俄國「十月革命」與一戰結束前後的反戰浪潮影響下，帶有「互助論」色彩的「勞工神聖」理念，開始真正受到知識份子群體的重視<sup>55</sup>。

對於勞工神聖的議論，不僅針對的是當時思想界所關心的軍人問題，更多時候其實反映的是王汎森所謂知識份子在時勢鉅變下「自我邊緣化」的表徵之一，即由推崇「四民皆士」到主張「四民皆工」的變化<sup>56</sup>。不過，一些敏感的知識份子卻發現，這正可為當時的「去兵」討論闡明一個方向。傅斯年在〈去兵〉一文中便認為「世界的將來，是勞動主義，是工本主義 (Industrialism)」，直言「用工作替代兵制」<sup>57</sup>。稍後彭一湖也主張「殘留軍隊的勞動化」，讓軍人從事「修築鐵路」、「疏浚湖河」、「造林」與「開荒」四事，並由此「建築一種勞動神聖的思潮」，養成一種「人生是勞動，宇宙亦是勞動」的「勞動哲學」<sup>58</sup>。

關於「化兵為工」的倡議不少，這些想法最初無疑源於知識份子，但當這種論調日漸高漲，再加上「廢督裁兵」的主張成為輿論主流時，一些社會力量和政治軍事力量也為之影響。1922年全國商會聯合會便發布〈築路養兵意見書〉，閻錫山、張國淦等人也都對「化兵為工」的構想提出自己的看法<sup>59</sup>。而對此構想最為熱心的，或許便是孫中山了。當時他一連發布多篇文字：〈工兵計劃宣言〉、〈和平統一宣言〉、〈實行裁兵宣言〉，提倡工兵計劃，並通電其他軍事力量，呼籲厲行其道。在他看來，應該將軍隊「次悉改為工兵，統帥編制，一切如舊，收其武器，與以工具，每日作工約六小時至八小時，先修道路，次及其他工事」<sup>60</sup>。

當然，這些軍事和政治勢力很難說是真心實意地支持工兵計劃，當時藍公武便提醒說，軍事力量之所以附和「廢兵論」，很可能是「欲假裁兵之名，以剪除異己之勢力耳」<sup>61</sup>。不過，無論這些看法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但是由文人鼓動，再到軍人應和，「去兵」及「化兵為工」的觀念漸次佔據了社會的輿論，並產生一定影響。1920年代，浙江軍閥頭目盧永祥便通電全國，發布廢督裁兵計劃，並親自擔任浙江軍務善後督辦，處置善後事宜<sup>62</sup>，而蔣方震更出版了三萬多字的《裁兵計劃書》，內容不僅涵蓋裁兵計劃所涉及之人事、財

務、制度建設等方面，而且還由表及裏，探討了背後的根源性問題<sup>⑤</sup>。丁文江在當時對二人作出頗為正面的評價：「這兩位一個是投閒置散的軍人文學家，一個是自廢自立的軍事善後督辦，意見居然相同，足見得他們的計劃，可以代表一班有知識的軍人的希望。」<sup>⑥</sup>

不過，在「去兵」和「化兵為工」的建議主導輿論的同時，也引發了一些知識份子對方案的疑慮。1923年，提倡「護法」的《孤軍》雜誌曾展開過一次關於「廢兵」問題的討論，其中大部分作者都是年輕人，他們並不為後人所熟知，但是其討論或許反映了當時部分知識份子的認知。例如，其中有人說，國內賢達的「工兵計劃」頗為詳盡，但問題的中心「不在應採取工兵制度與否，卻在於誰來執行工兵制度」<sup>⑦</sup>。另一篇文章也認為，「如何裁兵」固然重要，但不可忽略「如何才能裁兵」<sup>⑧</sup>。在他們看來，無論廢兵過程中的裁兵經費問題、軍官俸給問題，還是兵士安置的問題，均需要「用在極文明的國家，其國民很有力，而軍人很講理的時候，那才能夠使這些意見發生效力」。但對當時的中國而言，侈談廢兵其實「何異於與虎謀皮」<sup>⑨</sup>。誠如一篇文章指出：真正地執行廢兵，並不是靠知識份子「打幾個電報，做幾篇文章，請願請願，鼓吹鼓吹」就能夠實現的。他們漸次認識到：「想要推翻軍閥，我們第一非有一種足以推翻軍閥的強制力不可！我們有了這種實力，我們才能夠強制軍閥去廢督裁兵，強制軍閥去就範。」<sup>⑩</sup>

怎樣生成這種「強制力」呢？這看似又回到了晚清時以野蠻護衛文明的思路，但是在經歷了五四前後知識份子對軍人強權的批判浪潮後，這些年輕人強調的「強制力」與晚清時的思路明顯不同，希望在軍隊中用「好人」來替換「壞人」。在他們看來，「若以現在軍隊去除現在軍人，是何異於叫壞人去除壞人。去虎進狼，以暴易暴，到底還是一樣。這就不能不責望好人出來了」<sup>⑪</sup>。這種用「好人」替換「壞人」的想法，屬於五四以後瀰漫的一種社會思潮，如當時所謂「好政府主義」便與此有着相似的邏輯<sup>⑫</sup>。不過，「好政府主義」中「好人」與「壞人」之別主要在政客之優劣，而在廢兵問題的思考中，所謂「好人」與「壞人」其實是文人和軍人。《孤軍》刊出的文章認為，如要實現裁兵，首先「要智識階級首先徹底地覺悟」<sup>⑬</sup>。在他們看來，「治土匪必須用國軍，如今不肖的國軍自身也做了土匪。那末，除了為主人翁的好國民自己下手來剿滅，是沒有人替我代庖的」。這裏的「好國民」主要是指知識份子<sup>⑭</sup>。

對此問題，在上述蔣方震的《裁兵計劃書》中，便有一番頗為細緻的分析。與此前的「去兵」言論不同，蔣方震此時認為：「歐戰以還，一般人以反對軍閥，而尤厭談軍事，此其趨向，實為根本倒置。」<sup>⑮</sup>他指出，中國軍閥之所以橫行霸道，與德、日的歷史傳統不同，與英、法國民的軍人崇拜也不同，問題出於「國民之弱而無能耳」。而在所謂的「國民」當中，他對知識份子責之最深：「軍人雖盲目，而猶能『行動』；知識階級雖不盲目，而不行不動，此武夫得最高之權之所由也。軍閥之驕橫，非軍閥之恥，而正知識階級之恥也。」<sup>⑯</sup>同時，他認為真正的裁兵並非簡單地「以『人』裁『人』」，「於兵之外，求一物以制之」，而是應該「以『人』裁『器』」。這是因為，「武力之形質在器，而其精神在人」，而「兵力之後，尤更有其所謂最高力者」，即「人心之力」<sup>⑰</sup>。因而，從「形質」層面出發注重裁兵之規模與善後事宜等，只是流於表面的做法，更

為根本的是要從「精神」層面出發改造軍人。需要指出的是，蔣方震此處所謂的「精神」，並非泛泛而談，而是直接指向包括知識份子在内的「國民」。「國民」能否在新形勢下有所「自覺」，「盡各人之所能為」<sup>⑥</sup>，轉變軍人的負面形象，構成了能否真正解決裁兵問題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五四浪潮下也頗主張「去兵」的陳獨秀，其實比蔣方震更早地意識到這一問題，而且論述得更為直接。他一改過去將軍人與政客、官僚並舉，稱為「三害」的說法，作了〈歡迎新軍人〉一文，希望「新軍人」把為害社會的「舊軍人」淘汰<sup>⑦</sup>：

現在及近的將來或至於很遠的將來，我們都沒有理由主張絕對的廢兵論，而現在的軍人尤其是軍官卻十分為害於社會，這是毋容諱飾的。……救濟的方法既不能夠從根本上主張廢兵，惟希望有一班新軍人挺身而出，團結同志，將一班為害社會的舊軍人漸次淘汰乾淨。這可以叫做「軍人自決」，也可以叫做「軍人自治」。

陳獨秀的這篇文章是以廣東軍人為言說對象，不免有其傾向性，但從這個論述中，我們還是能夠看出他對於軍人的別樣看法。所謂「新軍人」，「並不在他的軍事學勝過舊軍人，他所以與舊軍人根本上絕對不同的是在兩大信條：一是要做社會公有的軍人，不做個人私有的軍人。……二是要做有生產力的軍人，不做單純消費的軍人」<sup>⑧</sup>。

可以說，從陳獨秀、蔣方震到《孤軍》同人，這些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初的言論，道出了五四以後知識份子眼中軍人形象的整體變化<sup>⑨</sup>。歷經五四時期的「去兵」浪潮，他們已不可能用晚清那種「強權對抗文明」的方式應對當時的軍事亂局。相反，他們試圖在某種程度上強調文治傳統的重要性，以知識份子的理念刷新軍人形象。但問題在於：他們在背靠五四「去兵」的時代氛圍之餘，也清醒地認識到那套空想的「去兵」方案不能解決軍人問題。正是在這種騎虎難下的形勢下，當時對於軍人的理解出現了一種不乏悖論性的認識：一方面認為應當以新思潮理念影響和改造軍人，去除晚清時軍人霸道和強權的形象，為他們賦予新的職責；另一方面承認軍人存在的正當性，不輕言「去兵」，以新軍人取代舊軍人。前者具有強烈理想主義氣息，認可在五四浪潮洗禮下的人道主義、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而後者則挾以近似晚清時期那種濃郁的現實主義特質，直面軍閥割據與帝國主義勢力橫行的現實處境。

回到本文所探討的「主義之軍」崛起的內在理路上看，此種悖論性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隨後出現的、歷來被視為外來的軍人形象，其實並非橫空出世之物，而是有着與其相呼應的中國思想情境。從陳獨秀、蔣方震、《孤軍》同人的悖論性認識，到蘇俄黨軍體制的引進，中間隔着一段時間。在諸多關於黨軍體制的研究中，研究者對共產國際對於國民黨的影響津津樂道，特別是鮑羅廷(Mikhail Borodin)在1923年前後影響孫中山「以黨建軍」的決策，以及蔣介石在1923年8月率團赴俄考察後對黨、軍結合的「俄國赤衛隊」留下深刻印象<sup>⑩</sup>。但是，如果我們僅將1920年代中期軍人形象的鉅變歸因於外源性因素，那麼如何解釋此前知識份子對軍人的思考，便構成了歷史解釋上的難

題。事實上，若不帶歷史偏見，我們會發現五四以後知識份子對軍人形象的悖論性認識，與他們稍後對軍人觀感的鉅變之間有着明顯的延續性。

在1925年黃埔學生軍所組織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主辦刊物《中國軍人》中，一些年輕軍人也以類似五四知識份子的口吻指出，此前「中國的禍亂，完全是軍人造成的」<sup>③</sup>，並認為過去的中國軍人「像一盤散沙」，「受人的包圍，就個個跪在地上投降；若是受了人家的游說，就常常被人利用」。但是，他們卻並不打算放棄軍人的身份，認為此前的中國軍人之所以遭人詬病，乃是因為他們「對於主義則茫然不知」<sup>④</sup>。如果透過「主義的結合」、「革命精神的結晶」，打倒軍閥，去除帝國主義勢力，那麼未嘗不能夠實現軍人的價值<sup>⑤</sup>。

這種對軍人的悖論性理解，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政治部於1926年創辦的《潮潮》雜誌中也有所體現。在一篇關於軍人干政問題的文章中，作者回溯民初的亂局，認為從1917年黎元洪、段祺瑞的「府院之爭」所引起的督軍團問題，到此後的直皖戰爭、直奉戰爭，問題無不出在「軍人干政」上。他認為，所謂的「干政」可分為兩種：「(一)是人民干政；(二)是軍人干政。」舊式軍人「完全不了解政治」，只圖「升官發財」，「倒行逆施害國害民」，當然要受批判，但新式軍人維護「民權」，受過「軍事教育」，也得到「政治訓練」，與人民干政其實無異<sup>⑥</sup>。而在一篇題為〈要怎樣不致變成軍閥〉的文章中，一個年輕的軍人則對當時社會流傳有關「有軍即閥」的看法進行反思。他首先承認那些「領袖軍隊者」握有任免生死之權，「成『閥』是很容易的」，進而指出之所以會成「閥」，主要原因在於他們「沒有主義信仰、思想，不知道民是甚麼？國是甚麼？甚麼叫做世界？只曉得吃飯、睡覺、升官發財、做個人走狗的糊塗機械式的軍隊」。要是軍人有「光明燦爛的主義，信仰堅決，思想純潔，明白自己的責任是在國與民身上，及促進世界和平」，那麼即便領導軍隊者如何野心、如何奸詐，也「決不至於成為軍閥的」<sup>⑦</sup>。

像上述《中國軍人》和《潮潮》這樣的軍人刊物中所反映的看法，在國民黨北伐前後非常盛行<sup>⑧</sup>。就是在短短幾年時間內，標榜「主義」和「革命」的軍人形象迅速崛起，構成影響此後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國共兩黨的重要基石。這樣的軍人形象當然有外源性因素<sup>⑨</sup>，但若聯繫到此前晚清的「軍國民主義」和五四前後的「去兵」浪潮，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新式軍人充滿矛盾的自我定位，顯然延續了五四以後陳獨秀、蔣方震等人的悖論性認識：一方面他們面對晚清民初的軍人強權所構成的亂局，已經不得不接受五四「去兵」浪潮下將軍人定義為亂局源頭的看法，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思潮的薰陶；但是另一方面，他們的觀點似乎與晚清對軍人形象的看法不乏互相呼應之處，都接受了一套現實主義的邏輯，不再像五四知識青年那樣高談理論，而是鮮明地將打擊目標朝向軍閥和帝國主義。

## 四 結論

上文描述了晚清到1920年代中國軍人形象變化的歷史脈絡，特別對所謂「主義之軍」的興起作一個簡單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中國軍人形象的



變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晚清民族國家建構浪潮中的「國家之軍」。這個階段最初的設想是通過「形式」與「精神」的二分法，為當時軍隊注入民族國家的精神理念。同時，由於思想界對日趨嚴峻的時局有所認識，對軍人的期待逐漸變為軍人崇拜。第二，五四運動前後的「去兵」浪潮。在這個階段，主要緣於軍人強權所引發的政治亂局和歐戰後全世界批判軍國主義的潮流，「去兵」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第三，1920年代「主義之軍」的崛起。知識份子發現所謂「去兵」主張不過是一紙空文，不僅不能夠實現其目的，反而可能被軍閥利用。雖然其中一些知識份子試圖用勞工代替軍人，也制訂了一些計劃，並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反響，但另有一些知識份子意識到，關鍵問題不在於是否廢除軍人，而在於軍人的革命性和思想性。因此，「去兵」的思潮轉變為「歡迎新軍人」，不僅在知識份子中逐漸達成共識，最後也影響到軍人群體自身，並在「主義」和「革命」的名義下，逐漸構成影響中國革命和政治歷程的重要力量。

這當然不是要否定「主義之軍」的外源性因素（蘇俄黨軍體制的引入），而是試圖從勾勒晚清到五四前後知識份子對軍人形象的認知變化，指出這種變化背後有其內在歷史脈絡。晚清以來，思想界往往主張以軍人來急速整頓和掃除橫互在民與國之間的障礙，有着近乎要將社會秩序軍事化的思想傾向。富強固然是知識份子最關切的所在，但是背後影響更為深遠的是，以強力實現社會秩序軍事化的思想傾向。這對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甚至是包括軍人在內的各個階層，都是一種極大的思想誘惑。民初亂局雖然表明這種力圖將社會秩序軍事化的努力存在一定障礙，但這種思想傾向在五四以後卻又因接受了極具道德色彩的「主義」改造，而以舊貌換新顏，重新出現在近代中國的戰爭與革命進程中。社會秩序軍事化的思想傾向由此披上了一層德性面紗，以改頭換面的方式給中國的現代轉型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1919年12月，經歷了五四學生運動的羅家倫在回覆張繼的一封信中，曾敏銳地從中國辛亥革命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對比中，發現民初以來之所以軍閥橫行，一個關鍵因素在於「中國的革命是以金錢權位來運動軍隊來的，而俄國的革命是以思想主義征服軍隊來的」。要想中國的政治與軍事變得有序，重要的便是發動「思想革命」<sup>①</sup>。羅家倫在當時隱而未發的顯然是試圖以文人的思想改造軍人的蠻力，但是或許他未能想到「以思想主義征服軍隊」，不僅是一種俄國的傳統，後來更成為了一種中國的政治常態。而且，這背後還有着遠為複雜的、深入到整個社會秩序骨髓的曼妙魔力。

#### 註釋

① 具代表性的著作，參見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北京：三聯書店，1980）；熊志勇：《從邊緣走向中心——晚清社會變遷中的軍人集團》（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鮑威爾（Ralph L. Powell）著，陳澤憲、陳霞飛譯：《1895-1912年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78）；馮兆基著，郭太風譯：《軍事近代化與中國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② 新近的研究，可參見任偉：〈先黨後軍：中共早期與「槍桿子」關係考論〉，《南京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頁85-100；周峰：〈中共早期對武裝力量的理論探索與實踐（1921-1929）〉，《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1期，頁71-80；李翔：〈俄制束輪：國民黨軍隊黨軍體制的起源（1917-1923）〉，《民國檔案》，2016年第3期，頁66-77。值得注意的是邱立波所梳理的「從湘軍到黨軍」的脈絡，但其從所謂「軍事歷史—哲學視野」出發，立論與論證頗具歷史哲學色彩，與本文差異較大。參見邱立波：〈從湘軍到黨軍（1850-1950）——軍事歷史—哲學視野下的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學術月刊》，2014年第9期，頁157-64。
- ③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十九·論尚武〉，《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27日），頁6-7。本文所引《新民叢報》之出版日期，參考了李國俊的考訂。參見李國俊：《梁啟超著述繫年》（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 ④ 楊度：〈中國新報敘〉，《中國新報》，第1號（1907年1月20日），頁3。
- ⑤ 佚名：〈書籍廣告：《軍人》〉，《武學》，第1期（1908年5月30日），廣告頁。
- ⑥ 中國之新民：〈新民說十九·論尚武〉，頁1。
- ⑦ 奮翮生（蔡鏗）：〈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1、3、7、11號（1902年2月8日、3月10日、5月8日、7月5日），頁79-88、65-72、67-72、45-51。
- ⑧⑩ 百里（蔣方震）：〈軍國民之教育〉，《新民叢報》，第22號（1902年12月14日），頁33-52；35。
- ⑨ 如當時的《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江蘇》、《安徽俗話報》、《遊學譯編》等均開闢了諸如「兵事」或「軍事」等欄目，專門刊載相關文章。
- ⑩ 《武學》為留日陸軍學生於1908年創辦，在當時留日軍人群體中頗有影響。《軍華》為軍國學社機關刊物，創辦於辛亥革命前夕，楊曾蔚等人任編輯，與當時的軍政界關係密切。參見章開沅主編：《辛亥革命辭典》（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頁253、151。
- ⑪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謝亮生等譯：《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01-23。
- ⑫ 曾國藩語，轉引自羅爾綱：《湘軍兵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67。
- ⑬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96、100、101、164。
- ⑭ 中國之新民：〈新民說二十·論尚武（續）〉，《新民叢報》，第29號（1903年4月11日），頁4。
- ⑮ 中國之新民：〈新民說九·論自治〉，《新民叢報》，第9號（1902年6月6日），頁3-4。
- ⑯ 楊集詳：〈軍事芻言〉，《武學》，第6期（1909年5月19日），頁3。
- ⑰ 唐繼堯：〈論中國軍隊急宜注重精神教育〉，《武學》，第3期（1908年，日期不詳），頁13-14。
- ⑱ 天存：〈論今日當貴軍人（續第三期）〉，《武學》，第5期（1908年9月30日），頁6。
- ⑳ 宋邦翰：〈養成軍紀服從綱領說〉，《武學》，第1期，頁37。
- ㉑ 梁啟超：〈中國之武士道·梁啟超自序〉，載《飲冰室專集》，第二十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1、23。
- ㉒ 張灝：《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頁111-224；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頁61-89。
- ㉓ 佚名：〈軍國民教育會集捐啟〉，《江蘇》，第2期（1903年5月27日），廣告頁。
- ㉔ 藍天蔚：〈軍事與國家之關係〉，《湖北學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頁49。
- ㉕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載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二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455-60。
- ㉖ 中國之新民：〈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本（1903年10月4日），頁22。

- ⑳ 壯遊：〈國民新靈魂〉，《江蘇》，第5期（1903年8月23日），頁5。
- ㉑ 藍天蔚：〈軍解〉，《湖北學生界》，第1期（1903年1月29日），頁61。
- ㉒㉓ 劉基炎：〈武學發刊之意見書〉，《武學》，第1期，頁2-3；4。
- ㉔ 楊集祥：〈軍國建設〉，《武學》，第3期，頁71。
- ㉕ 楊曾蔚：〈神聖軍人論〉，《軍華》，第2期（1911年8月，日期不詳），頁9。
- ㉖ 嚴復：〈原強〉，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4。
- ㉗ 傅斯年：〈去兵〉，《新潮》，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1日），頁25-34；汪伊真：〈萬惡之「治」〉，《每週評論》，第9號（1919年2月16日），第4版；王星拱：〈去兵〉、胡適：〈武力解決與解決武力〉，《新青年》，第5卷第6號（1918年12月15日），頁571-74、565-70。
- ㉘ 藍公武：〈廢兵論〉、志公：〈廢兵之研究〉、謝楚楨：〈中國的廢兵與國際的廢兵〉、彭一湖：〈再論廢兵〉，《改造》，第3卷第3號（1920年11月15日），頁27-36、37-42、43-59、60-68。
- ㉙ 陳志讓：《軍紳政權》，頁16-112。
- ㉚ 王鴻：〈法國道路？還是德國道路？——歐戰與早期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頁118-24。
- ㉛ 受制於英國海軍的包圍，德國在1917年2月之後進行無限制「潛艇戰」，試圖不分國別打擊任何前往英國海域的商船。這不僅對於英國造成打擊，也使得包括中、美等國在內的中立國的利益受到干擾和破壞。就當時的歷史時勢而言，「潛艇戰」也是構成中國與德國宣戰的重要原因之一。關於當時思想界的觀感，參見滄海：〈潛艇戰爭〉，《太平洋》，第1卷第2號（1917年4月1日），「海外大事評林」欄，頁5-13；〈英首相喬治演說潛艇戰之影響〉，《東方雜誌》，第14卷第9號（1917年9月15日），頁201-202。
- ㉜ 梁啟超：《歐洲戰役史論前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14）。
- ㉝㉞ 梁啟超：〈歐戰結束之教訓〉，《每週評論》，第1號（1918年12月22日），第4版。
- ㉟ 陳啟修：〈從「北洋政策」到「西南政策」——從軍國主義到文化主義〉，《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3號（1919年3月），頁19。
- ㊱ 蔣方震：〈軍國主義之衰亡與中國〉，《改造》，第3卷第1號（1920年9月15日），頁15。
- ㊲ 蔣方震：〈中國之新生命——軍國主義與立憲主義之衰亡〉，《改造》，第3卷第2號（1920年10月15日），頁9、10。
- ㊳ 蔣方震：〈代軍閥而興者誰〉，《改造》，第3卷第3號，頁22。
- ㊴ 隻眼（陳獨秀）：〈我的國內和平意見〉，《每週評論》，第9號，第2版。
- ㊵ 陶履恭：〈軍國主義〉，《北京大學月刊》，第1卷第1號（1919年1月），頁36。
- ㊶ 守常（李大釗）：〈Pan……ism之失敗與Democracy之勝利〉，《太平洋》，第1卷第10號（1918年7月15日），頁1。
- ㊷㊸ 傅斯年：〈去兵〉，頁27-29；30、32。
- ㊹ 晉之：〈一個覺悟的軍人〉，《晨報副刊》，第29期（1923年12月17日），第3版。
- ㊺ 松廬：〈一個覺悟的軍人〉，《小說日報》，第125號（1923年4月15日），第2版。
- ㊻ 趙淳如：〈一個軍人臨死的懺悔〉，《小說世界》，第4卷第7期（1923年11月16日），頁2-3。
- ㊼㊽ 藍公武：〈廢兵論〉，頁33-34；36。
- ㊾ 晚清時在東京的《天義報》便高調地主張「廢兵廢財論」，倡導「人人作工，人人勞動」。參見劉師培：〈廢兵廢財論〉，載萬仕國、劉禾校注：《天義·衡報》，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頁81-85。
- ㊿ 較具代表性的文獻，參見蔡元培：〈蔡校長十六日之言說：勞工神聖！〉，《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1月27日），第4版。另外，《新青年》第7卷第6號（1920年

- 5月1日)的扉頁便特別印有「勞工神聖」四個大字，而且該號為「勞動節紀念號」，刊載了一系列與勞工問題相關的譯作和調查報告。
- ⑤⑥ 王汎森：〈近代知識份子自我形象的轉變〉，載《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頁277-304。
- ⑤⑦ 彭一湖：〈再論廢兵〉，頁63-65。
- ⑤⑧ 參見〈最錄——裁兵問題〉，《東方雜誌》，第19卷第13號(1922年7月10日)，頁125-38。
- ⑤⑩ 孫中山：〈工兵計劃宣言〉(1922年6月6日)，載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46；〈和平統一宣言〉(1923年1月26日)、〈實行裁兵宣言〉(1923年2月24日)，載《孫中山全集》，第七卷，頁48-51、131-33。
- ⑤⑫ 馮筱才：〈「軍閥政治」的個案考察：盧永祥與一九二〇年代的浙江廢督裁兵運動〉，《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2002年5月)，頁171-94。
- ⑤⑬ 蔣方震：《裁兵計劃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⑤⑭ 宗淹(丁文江)：〈裁兵計劃的討論〉，《努力週報》，第14期(1922年8月6日)，第2版。
- ⑤⑮ 壽康：〈甚麼是軍閥？怎樣倒軍閥？〉，《孤軍》，第1卷第4-5期(1923年1月)，頁3。《孤軍》雜誌的原頁碼為每篇單獨標識。
- ⑤⑯⑰ 肅清：〈推倒軍閥的具體辦法〉，《孤軍》，第1卷第4-5期，頁2；3。
- ⑤⑱⑲⑳ 思勤：〈裁兵廢督的先覺問題〉，《孤軍》，第1卷第4-5期，頁1；6；8。
- ⑤㉑ 壽康：〈甚麼是軍閥？怎樣倒軍閥？〉，頁4。
- ⑤㉒ 許紀霖：〈中國自由主義的烏托邦——胡適與「好政府主義」討論〉，《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頁115-33。
- ⑤㉓⑤㉔⑤㉕ 蔣方震：《裁兵計劃書》，頁56；50；51-52；55。
- ⑤㉖⑤㉗ 陳獨秀：〈歡迎新軍人〉(1921年1月1日)，載三聯書店編：《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北京：三聯書店，1984)，頁72。
- ⑤㉘ 在相關言論的發表時間上，陳獨秀最早(1921年)，蔣方震居次(1922年)，《孤軍》同人最晚(1923年)。上述未按照時間順序進行論述，乃是為了行文便利而作出相應處理。
- ⑤㉙ 對於國民黨黨軍體制的新近研究，參見李翔：〈黃埔軍校黨軍體制的創設：以孫中山、廖仲愷、蔣介石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頁51-67。新近的資料整理，參見陳宇編著：《黃埔軍校年譜長編》(北京：華文出版社，2015)，頁1-5。至於中共的黨軍體制則要來得相對較晚，具體參見任偉：〈先黨後軍〉，頁85-100。
- ⑤㉚ 袁寒：〈青年軍人與軍閥〉，《中國軍人》，第1期(1925年2月20日)，頁30。
- ⑤㉛ 曾幹廷：〈十大恥的禮物〉，《中國軍人》，第1期，頁42。
- ⑤㉜ 仁谷：〈我對於本會之希望〉，《中國軍人》，第1期，頁31。
- ⑤㉝ 汪滌陳：〈軍人干政〉，《潮潮》，第10期(1926年10月4日)，頁2。
- ⑤㉞ 胡競先：〈要怎樣不致變成軍閥〉，《潮潮》，第4期(1926年8月17日)，頁9。
- ⑤㉟ 王建偉：〈1920年代國民黨人「去軍閥化」的努力及其成效——以黃埔軍校的創建為中心〉，載李楊、曾慶榴主編：《黃埔軍校研究》，第九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5)，頁26-28。
- ⑥① 譬如在《潮潮》雜誌中便有文章指出「革命軍人」具有「黨員」與「軍人」兩重身份，明顯受到黨軍理念的影響。不過，該文中以「革命軍人」(而非「黨軍」)來稱呼軍人群體，似仍有一定區別。參見王崑崙：〈革命軍人之天職——敬告本校全體同學〉，《潮潮》，第1期(1926年7月19日)，頁6-18。
- ⑥② 羅家倫：〈羅家倫回覆張繼〉，《新潮》，第2卷第2號(1919年12月1日)，頁366-67。